

由反思所引发的批判意识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这种反思照格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的观点来看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社会分析的对象，其次是这种分析的语言，再次是这种分析的分析者的位置。换言之，先前的以中性的语言来解释原始材料的起支配作用的理想现在受到了挑战，并逐渐为一种在时间的历程中以及在与行动者的意义的关系上来理解人类的行为的思考范式所取代。⁷

这种取代实际上是对西方社会学客观性原则的批判。在客观性原则的支配之下，从事调查的田野工作者与他所要调查的本土人之间在劳动的分工上有着明显的区分。孤独的田野工作者是有文化的人，而本土的人则不是。依照客观性的田野工作的规范，本土人是在说话，而田野工作者则是在记录。而照帝国主义的规范来说，本土的人提供了原始的材料或数据，用以在大都市里进行分析和加工，二者之间是极为相似的（Rosaldo 1989: 31）。所以才会有特纳所说的，民族志的“眼睛”便是帝国主义的“我”（Rosaldo 1989: 41）。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自六十年代以来的批判意识的回归，这种回归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对自己学科以前的客观主义的范式的主动抛弃。在经历了这样的一种范式转换之后，经典的人类学的写作经历了新的批判，像埃文思·普里查德所描述的努尔人社会的一体化的、静态的特征受到了后来学者的质疑。人们开始追问在英国的殖民者的所谓寻求和平的统治之下。难道努尔人不经历什么改变这样的问题。

反观我们学术的发展史，我不得不说在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历程上，曾经有过一种内部殖民的宇宙观念大行其道的时期。这种宇宙观念以知识的有无为依据将中国的社会分化成为有文化的城市和无文化的乡村这样的两个部分。另外城市和知识分子展现的是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心态，而乡村和农民被看作是要被现代知识所征服的殖民地。

另外，这里应该重申的一点是，我们的调查并非充足，而是不够。够的是数量，而不够的是深度。这种深度含有两个层次，一是我们或许需要有更长时间和更持久的耐心来调查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实际；而是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主流话语的同时也应该批判自我。在今天或许应该牢记在心的是，我们研究和分析的对象，他们也有权力来对我们的书写、伦理和政治进行询问。如此一门含义丰富的社会学才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扎下根来。

人类学的中国与世界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教授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有不少学者论述了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为了在中国学术领地中恢复人类学的地位，大多数学者把他们的入手之处放在人类学学科如何从其他学科中分化出来以及人类学如何通过应用研究来引起国家的重视这两个问题上。我能理解这两种看法提出的缘由，但不能赞同其入手方法。首先，我认为，人类学学科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于它的田野工作方法和论述风格（包括理论）的独特脉络上。倘若中国人类学者不对自身学科的这两点独特性出发谈问题，而是反复地重复学科之间关系和矛盾的“故事”，那么，学科建设就会成为空谈。其次，

⁷ 参阅 Renato Rosaldo (1989) 第 37 页的内容。



我还认为，中国人类学者当前的使命，恰恰不应在于重构学科的国家依附性，而应在于反思这门学科长期以来的国家依附性以及这种依附性所给予当前学科发展带来的知识论制约。这里我将集中谈谈后一个问题。

华勒斯坦及其支持者认为，“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要以国家的疆界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8 页）。在欧洲的语境中，这一社会科学的国家品质论，虽可能符合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特性，但却不符合人类学的基本论述特性：在西方，人类学学科更多地带有“走向世界”、否定民族—国家疆界的世界主义色彩。然而，华勒斯坦的这一看法，却确实符合中国人类学的事实。人类学这门西学的“中国化”是随着世界格局和国家形态的演变而展开的，它基本上经历了（1）19 世纪末到 1927 年人类学启蒙知识的传播、（2）1927 年到 1949 年国族建设背景下的学科建设及（3）1950 年以后“冷战”背景下国家制约力量的增强和人类学进一步“内部化”这三大阶段。这三阶段的发展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学科国家化随时间推移而得到不断升级的趋势。19 世纪末，古典人类学之引进，与建立强大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努力一致；20 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所具有的实证主义态度，与民族—国家境内民族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问题有着密切关系；五十至七十年代，尽管台湾海峡两岸人类学命运遭遇十分不同，但其服务于国家的品质，却在借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和苏联民族学的不同风格中得到同样的增强。

什么东西可以解释人类学在中国的国家化特征？我在其他论述中已经指出，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国家的社会容器”特征的形成，与民族—国家概念同中华文明体系之间的张力有着莫大关系（拙文“汉语人类学：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这里有必要重申，在世界格局中，中华文明属于一个文明体系；而若以文明体系而非民族—国家体系的疆界来考察这个文明，则在后殖民的时代，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自有它的“文明独特性”。相比部落基础上建立的后殖民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原来所包括的文化类型及生活方式要远为多元。在这样一个类似于帝国的体系当中，不同文化的原有历史纽带与被期望成为主流的汉语文化有着更深刻的差异性。人类学专注于这样的内部差异性的研究与治理，显然不无它的特定历史背景和根源。这门学科长期以来对于文明内部文化和族群差异性的关注，是以失去人类学本来怀有的海外文化研究旨趣为代价的；而现实中，这样一种代价或许是必然和必要的。然而，从文明的内部“异化”衍生出来的大量偏狭的文化自我论证，却已经对于我们认识世界中的他人和自我产生巨大的障碍。

在 20 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中国人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民族学研究者而言，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首先表现为作为学科的民族学重新得到了重视。同时，恢复三四十年代初步得到发展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框架并以此为基础上重新建构人类学，也成为中国学界的主要动向。与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地位的恢复不无关系地，80 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走出少数民族研究、朝向汉族本土社会研究的趋向，这一趋向结合了与西方汉人社会与文化的研究的直接对话，它的作用在于促成汉语世界人类学者对于 30-40 年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继承及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门的打开，大量西方人类学论著也被翻译为中文出版，这些论著包括分析性的原著及教材，涉及面已经不局限于个别概念的介绍，而于 90 年代进一步涉及到人类学学科及研究品质的实质性问题。

然而，二十年来人类学令人乐观的情状，不能掩饰历史和当前社会科学语境的制约给身处其中的学者们带来的困境。事实上，除了学科恢复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之外，人类学者尚未清醒认识到他们自身与 20 世纪人类学的历史及其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与世界文明体系的转型之间可能构成的关系。西方人类学在 20 世纪初期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人文思想革命，这个革命的成就就在于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改造成为一个试图透过非西方文化的镜片来窥视西方文



明体系的局限性和现代命运的知识体系。相比之下，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地区人类学者当中，还是在台湾、香港、以至移民到西方和日本的汉语人类学者当中，从西方学习来的人类学知识体系，却长期缺乏这种对于异文化的自我反思意义的追求。尽管汉语世界的人类学理论大多来源与西方，但 20 年代开始在西方呈现出起精神面貌的人类学“文化良知”，却向来未在汉语世界占主要地位。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的人类学”，除了个别例外，集中地表现汉语世界对于自身文明体系的边缘社区及体系内部的少数民族族群文化的关注。从跨文化认识的角度看，对于边缘社区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本来也应当可以属于“异文化研究”的一种类型。然而，当边缘社区、少数民族文化与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及其象征体系）构成关系时，其“异文化”的色彩即因可能拥有主权合法性的权力体系需要对社会加以治理，而转变成为治理的对象。即使如此，人类学在其间的角色，本来也应当可以包括从边缘社区和少数民族来反思国家化的文明体系之主体这一面。然而，这种有限的“文化良知”，时常为民族—国家的社会治理需要所冲淡。

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起，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即缘起于试图在一个宏大的文明体系基础上建立多文化民族—国家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对于发挥文明社会的本土人类学研究之优势，本来确实是有它的裨益的。然而，它对于文化意义上的“非我”的意义发掘，却也不无阻碍作用，它至少能因为使人类学者满足于民族—国家或区域性政权内部的“异文化”（边缘社区和少数民族）的“本土人类学”研究，而造成跨文化人类学理解的缺失。我们不应否认，中国人类学者对于身处其中的文明体系及其内在的复杂性进行本土人类学的探究，将有助于促使世界体系形成以后西方世界观的二元化向一个更为复杂的观念形态转变，或者至少可以说，在西方—非西方之间加进一个相对模糊的形态；但若站在人类学本身的立场来体会对于研究者自己文化之外的文化的研究旨趣，则对于汉语世界自身文明的边缘—与中心关系的探索，虽不无历史必然性地成为 20 世纪中国人类学的总体特征，却不应继续作为唯一的知识体系支配学界的探讨，因为尚待我们探索的问题，还应包括如何在一个文明多极化的世界中延伸在文化中心主义的自我反思中确立起来的社会人类学世界观。要从事这项工作，就要求中国人类学者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展开对于“非我”的文明体系的广泛研究——这一点，正是我依据中国人类学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有关学科未来发展的倡议。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关于《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卷第一辑的编辑说明

邱泽奇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副教授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恢复和发展已经 20 多年了，工作在这个领域的人们，一方面继承中国社会研究的传统，把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同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积极吸收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新成果，并努力把新的知识积累运用到中国的社会学实践中来，为中国社会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看到，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的不足。第一，基本上还陷在“社会学中国化”或“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中。在日益向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不仅关乎中国 12 亿人口，也直接影响到中国以外的社会；同样，发生在中国社会以外的很多事情也直接影

